



日本中国学文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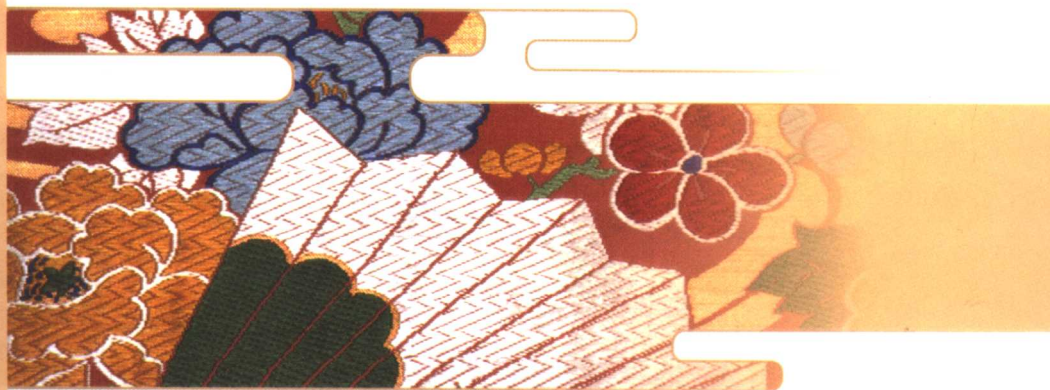
王晓平◎主编

谷崎润一郎与 东方主义

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

〔日〕西原大辅◎著

赵怡◎译



中華書局



日本中國學文庫

王曉平◎主編

谷崎潤一郎與 東方主義

大正日本的中國幻想

〔日〕西原大輔◎著

趙怡◎譯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日)
西原大辅著;赵怡译. - 北京:中华书局,2005
(日本中国学文萃)
ISBN 7-101-04716-5

I. 谷… II. ①西…②赵… III. ①谷崎润一郎-人物
研究②东方哲学-研究-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
IV. ①K833.135.6②B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357 号

书 名	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
丛 书 名	日本中国学文萃
著 者	〔日〕西原大辅
译 者	赵 怡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1}{8}$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716-5/K·2019
定 价	22.00 元



总 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官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



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



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



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



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常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中文版序

西原大辅

每个国家的国民都不免或多或少地会对其他民族持有某种偏见,要全面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不能不说是一桩极为困难的事情。日中两国也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国民对其他亚洲国家抱有各式各样的成见,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说什么朝鲜人依旧过着原始时代般的日子,又认为中国人只管挣钱,不问政治,诸如此类。而我也常常发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些中国人,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对日本社会的偏见。

这本书以谷崎润一郎为例,考察了以大正时代(1912~1926)为中心的日本东方主义话语。东方主义诞生于十八世纪末的西方世界。美国比较文学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于1978年出版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78)一书,尖锐地批判了西方国家的文学、美术和学术著作将东方视作是一个没有发展余地的落后社会的观点。事实上,这种东方主义的观点也影响到了近代日本对其他亚洲国家的看法,因此日本人的中国观也受到了产生于西方的东方主义的影响。我将在本书中详细分析日本的东方主义话语如何发生以及如何传播的过程。

谷崎润一郎虽然是个举世闻名的文豪,可是他的有关中国的作品却直到最近才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谷崎于1918年和



1926年两次踏上中国大陆,并创作了十几篇游记、小说和随笔作品。由谷崎开拓的所谓“支那趣味”(本书中译为“中国情趣”)曾经风靡一时,给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和木下杢太郎等同时代的日本文学家们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目前研究日本近代文学的日本学者中,很少有人懂中文的。而本书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基础,不但分析了谷崎作品中的东方主义话语,还尽量涉猎了日中两国的资料,对谷崎的两次中国之行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考证。

本书译者赵怡女士是我十几年来的同学。她日语说得既流利又优雅,在日本文学方面也有很深的修养。这次能够通过她将我的《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中央公论社,2003年)译成中文,并承蒙中国读书界的抬爱而得以出版,我感到十分荣幸。

近年来,日中两国国民之间虽然往来交际愈加密切,但双方偏重经济交流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日本公司只关心如何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中国经济界人士又往往热衷于从日本募集资金,或向日本出口产品以获取经济效益。商业交易固然重要,但是我担心这种重商轻文的倾向,以及政治上的自我中心观念,只会造成两国间真正的关心和友谊大幅后退。因此我相信在目前这样的时代,研究谷崎润一郎和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之间的亲密交流,一定会更为重要,也更具意义。



译者序

赵 怡

一

谷崎润一郎是东京大学出身,也同荷风一派,更带点颓废派气息。《刺青》、《恶魔》等,都是名篇,可以看出他的特色。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8年

谷崎在日本近代文坛建筑的金字塔,巍然在东岛的朝日夕烧中放着特异的光彩。

他是那么掘井似的毫无容赦地向他的心灵深处发掘去,得到的便是这一些不可逼视的东西。他自己叫它作“丑恶”,而在文学史上留下的是瑰宝般的“艺术”。

田汉《〈人与神之间〉》译者序,1932年

谷崎润一郎氏的《春琴抄》是一篇难以言喻,惟有叹息的名作。

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氏的〈春琴抄〉》,1933年

《疯癫老人日记》和《睡美人》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选



择了被单纯的、平淡的、也就是小市民式的性的关心所拒绝了,或者是拒绝了这种性的人物作主人公,从而甩却了那种俗恶的性娱乐所具有的那种令人恶心的温吞水般的通俗性,而去追究老、或者死这种人类深切的真实的主题。这两篇小说都渐渐地在“反性”的精神觉醒剧中达到高潮而完成。

大江健三郎《谷崎润一郎与官能主义的实验小说》,1966年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早期作品追求从嗜虐与受虐中体味痛切的快感,在肉体的残忍中展现女性的美,故有“恶魔主义者”之称。中后期作品回归日本古典与东方传统,在与诸多社会关系疏离的背景下,幽微而私密地描述了中产阶级男女之间的性心理与性生活。谷崎的小说世界充满荒诞与怪异,在丑中寻求美,在赞美恶中肯定善,在死亡中思考生存的意义。他的散文世界则洋溢着浓郁的日本风,耽溺于阴翳的神秘、官能的愉悦与民族的风情。

(电子书库·外国文学<http://www.cnread.net/cnread1/wgwx/g/guqirunyilang>)

以上罗列了对日本近代文学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的各种评价,希望读者对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谷崎一生著述甚丰,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刺青》、《恶魔》、《春琴抄》,长篇小说《痴人之爱》、《细雪》、《疯癫老人日记》等,此外还留有大量的随笔散文,以及日本古典文学《源氏物语》的现代语翻译。不过作为一个举世



闻名的文豪，谷崎在中国却似乎不像他的同辈芥川龙之介，或者晚辈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那么广为人知。其实有关他的译介，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层出不穷。八十年代以后，他的主要作品中也有了新译，其中《阴翳礼赞》、《春琴抄》、《细雪》还有多种译本，尤其是2002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四集一套的《谷崎润一郎作品集》，较为集中地翻译了谷崎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

不过出自日本年轻的比较文学学者、广岛大学教育系副教授西原大辅之手的《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并不是对谷崎为人与作品的全面分析，而是紧紧围绕着谷崎与中国的关系、他自幼受到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他的古典汉诗文功底的形成、他对中国文化的景仰、他的两次访华历程、以及他的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的探究考察，同时运用“东方主义”理论作为主轴加以分析批判而写成的一本学术著作，不过并不深奥，尤其对于一般中国读者来说，也许会因为其中的中国话题而倍感亲切。

二

所谓“东方主义”，原本是指十八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发现”埃及之后，欧洲的浪漫派文人墨客对非洲和中近东这些“东方”世界所作的具有异国情调的描绘，或者指以东方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而1978年美籍巴勒斯坦裔比较文学家爱德华·赛义德在其题为《东方主义》的大作中，尖锐地指出，在这些东方情趣的背后，是建立在帝国主义背景上的、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因此给予了东方主义以新的定义，并因此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之一而风靡世界。需



要指出的是,原本作为欧美东方主义之对象的日本,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处于一种特别的位置。正如本书所引《东方主义》日文本译者今泽纪子的论述:“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日本无论从地理的、还是文化的角度来说都属于非西方世界,自然属于客体=被观察方。但是由于近代日本选择了跻身帝国主义列强队伍的道路,在殖民地经营上积极汲取西方思想。(中略)因此,日本同样摄取了西方的东方视点,将自己置身于东方主义的主体=观察方一边。”因此,日本的文人画家,也学会了将朝鲜、台湾,以至中国、印度都划归成自己的“东方世界”,而投以东方主义的视线。不能忘记的是,因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深厚的古典汉诗文功底日本作家,往往对中国文化深怀景仰,并以此作为他们批判日本社会盲目崇洋倾向的武器。然而一旦他们面对处于半殖民地状况之下的、落后停滞的中国现实,他们的反应却大多是轻视和排斥,同时自己作为“脱亚入欧”之“优等生”的优越感又油然而生。这种心理我们可以从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很多著名的作家身上看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正时期,随着近代交通网络的发达,海外旅游热高涨,去中国旅行不再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因此,日本文人对中国的认识,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仅凭着从高深的汉籍中得到的那点书本知识。他们的中国印象,随着实地勘察的人们所写的纪行文字和美术作品,甚至随着他们自身漫游中国时的亲身体验,而变得更为丰满具体起来,同时又带有某种“异国情调”。西原指出,正是流行于大正时期的这股“中国热”(当时的日本将其称之为“支那趣味”),成了谷崎润一郎大量创作中国题材作品的背景。



谷崎润一郎一生中仅有的两次海外旅行,其目的地都是中国。1918年谷崎润一郎从当时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进入中国后,历访了沈阳、天津、北京、汉口、九江、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历时两个月,完成了他“周游中国”的计划,同时这次访华又成了他创作大量中国题材作品的引爆剂。1926年谷崎第二次访华,但这次只在上海度过了整整一个月,并和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交往。然而奇怪的是,原本是为了收集素材而重赴大陆的谷崎,回国后却从此放弃了中国题材小说的创作,这又是为什么呢?

谷崎润一郎早期的“西洋崇拜”和晚年的“回归日本”中间,还横跨着一个“中国”情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然而对于谷崎两次访华的详情,由于资料的欠缺,一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薄弱环节。就是习惯于追究作家生平的每一个细节的日本文学界,对此也不大提及,而且对谷崎的一系列“中国情趣”作品的研究,也很不充分。本书的突出之处,在于作者不仅以大量的、来自中日双方的第一手资料让这个原本在学术界没有得到充分展示的侧面变得轮廓清晰起来,而且更将其置放于“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这个大环境中加以分析考察,指出谷崎的所谓“中国情趣”,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大正时代文学界、美术界的一种共识,这使他的研究变得更为丰满、更具立体感了。

为了留有一些悬念,译者并不想在这里详细介绍本书的具体内容。然而通读本书,译者印象最深的在于谷崎润一郎和中国文人之间的真挚友好的交往。从谷崎的笔下,我们能够感受到郭沫若、田汉的一席话给予他的震动,他和田汉在上海朝夕相处整整一个月的情景也是历历在目。尤其在和欧阳予倩的家人共度除夕之夜



后的那份发自内心的感怀,至今读来仍有着动人心弦的力量。而且读着这些文字,我甚至会想这果真是出自那个热衷于描绘性倒错的、被称为“恶魔主义”作家的谷崎之笔吗?这不禁令我想起一段有趣的插曲:谷崎在写作《细雪》期间,想雇用一位年轻女子担任自己的大阪方言翻译,并出于写作上的方便,希望她住到自己家里来。而女孩的父亲因为谷崎那些充斥着性呀欲呀的作品和他的种种绯闻,坚决不同意,并亲自带着女孩上门回绝,可是在和谷崎告别时却突然说出:“那么,女儿就交给您了。”因为父亲通过自己的观察,确信了谷崎是个值得信赖的人物。事实上,生活中的谷崎确实有着性格温厚、重情重义的一面,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本书的介绍中得到证实。尤其是中日两国战火正烈的1942年,谷崎润一郎写作了《昨今》一文,详细回忆了自己和中国友人之间的交往和友情,以及他阅读胡适、丰子恺、周作人、林语堂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心得。战争期间,谷崎埋头于日本古典文学《源氏物语》的现代语翻译和长篇小说《细雪》的创作,以避免与军国主义者为伍,这些事实常为人称道,但他的这篇《昨今》称得上是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良心的表白。这里面确实已经很难找到早年作品中的那种东方主义式的居高临下的视线了。

同时,阅读谷崎的文字,也令译者重新领略了唯美派大师的那般绚烂华丽同时又行云流水般自然亲切的笔调。比如他描述苏州的水和桥:

房屋都背水而建,但多数人家都有着面向河水的阳台,显现出水和人家的亲密关系。水仿佛要浸进人家,人家仿佛在跟水嬉戏,有时看上去,那四壁围起来的房子倒